

他们是青春年少的学生,他们记忆中的1949年4月 那几天,学校还是正常上课

1949年,3名不同年龄的学生经历了南京解放所带来的变化,与生活在社会上的南京市民相比,校园似乎相对平静,他们还是正常上下学,写着毕业论文……

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戎丹妍 白雁 文/摄



挹江门挡住了回家心切的女学生

口述者:谢杰(化名)女 生于1934年 南京解放时住江心洲,初中生

1948年农历腊月,明德女中放寒假,我离开莫愁湖的学校,要出城回江心洲的家。到了挹江门,却发现城门大门紧闭,只在旁边开了一个小门,供行人进出,进出的人一律不准带行李。拖个大箱子的我,只得无奈折返。

1949年1月,大兵把守挹江门,我差点回不了家

上世纪30年代,我随父母从湖南来到南京。父亲到南京没多久就去世了,母亲从姨妈那里借钱,在江心洲买了20亩地,成了地主。南京沦陷那几年,江心洲由于地理位置特殊,日本人不管,国民党也不管,居民日子倒也太平。

抗战胜利后,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从抗战前线来到南京,他说国共两党就要打仗了,劝妈妈把地卖掉,妈妈就卖掉了一部分地,另外一些实在舍不得,就留下了。1946年春天,蒋介石还都,我们都跑去看。记得是在一个机场上,很简陋,跑道上都是石子,蒋介石一旁站着宋美龄,另一旁站着何应钦。国府还都不久后,开始发行金圆券,各家各户的孙中山头像银币一夜之间就被收走了。

1948年秋天,我到莫愁路的明德女中读初一。这是个教会学校,校长是陈黄丽明,她人长得好,

英语也好。那时候,风传解放军就要来了,南京城开始乱了,市里有人抢米,乡下有穷人到别家地里拔萝卜吃,别人也不敢怎样。有时候,我们会听到炮声。浦口泰山新村那里,原先有个宝塔,那段时间被轰塌了。

这年农历腊月,放寒假了。算起来,那时候应该是1949年1月了,我拖着箱子离开莫愁路的学校,要经过挹江门回家。到了挹江门,发现大门紧锁,旁边开个小门,有个拿枪的大兵把守。进出城门,规定只能单个人走,不能带行李。有的男同学,就把行李从关着的城门下面塞出去。那大兵看到了,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。我一个人,没人接应,箱子带不出去,没办法,只好又拖着行李走回市里。我把行李寄放在石鼓路一位姓张的阿姨那里,又走回挹江门,再到下关,坐船回到了江心洲。

一个姓王的老师带着大家贴标语,欢迎解放军

1949年春节后,八卦洲办起

了一所圣池中学,妈妈就让我转学。先是带了两块咸肉、两块咸鱼到邻居一个老师那里补课,然后去考试。我记得考了二元一次方程,还有老师问我,战国七国是什么。我被录取了,而且跳一级,读初二了。

那年春天,我的生活倒是没受什么影响,正常上过日子。大概是4月份,八卦洲突然来了一批国民党的军队,很快又走了,应该是撤退。我家邻居有个女孩,就跟着国民党的一个连长走了,不过,他们在半路上被抓到,又回来了。

解放军渡江之前,我们这边有渔民去接应,我家成分高,没去成。南京解放后,江心洲来了解放军,他们穿着布鞋,老粗布裤子,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姓王的老师,带着大家在墙上贴“共产党万岁”“欢迎解放军”等欢迎标语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就被选成了学生会主席,还带着大家排话剧,内容是一个农民的女孩被地主抢走了,和《白毛女》差不多。



南京解放那天,我第一次翻墙进了宪兵队

口述者:秦永辉 男 生于1931年 南京解放时住门西下浮桥,高中生

1949年4月23号,秦永辉到了学校才知道不上课,不少老师跑走了,校长陈重寅也走了。隔壁宪兵队也全部跑空。他和同学爬围墙进去玩,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翻墙进宪兵队。

我1931年在南京出生,是老城南人。6岁那年,我随家人逃难到安徽泾县,再一步步退到湖南、四川。1940年日军对重庆轰炸,我家被炸得光光的,生活没了着落,所幸性命保住了。那时我已9岁,民族仇恨在心里种下了种子。

1945年日军投降后,第二年家人带我返回南京。再苦都要回来,因为南京是我们的根。回南京后,我先后在金陵、钟英、一中读书。1949年1月时,已经是一中的高一学生。那时金圆券、银圆券贬值,钱不值钱,只有“袁大头”相对不贬值。我记得三山街沿途都有人在叫卖“袁大头”。像我们这样的城市贫民,日子很苦,头晚上买一斗米,明早糊糊,下午就没有吃

的了。那时沿街还有很多百姓卖烤大饼。那是国民党发动百姓做的,支援前线部队,在战场上进行空投。

1949年4月22号夜里,我听到了枪炮声,从水西门那边传来的。但是,当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不过通过看报纸,知道了国民党的局势变了。那时,我的表姐夫(后来知道他是地下党)想发展我入团,我已经写好了材料,但是很快南京解放的消息就传来了。

4月23号,我还记得那天是个星期六。我到了学校才知道不上课,学校乱糟糟的,不少老师跑走了,校长也走了。

隔壁宪兵队也全部跑空。我和同学爬围墙进去玩,虽然只有一墙

之隔,但是平时不可能进去。前一天晚上里面还有人,就一夜之间,人全跑光了。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翻墙进宪兵队。

到了下午,我看到两个穿着破旧棉袄,背着盒子枪的侦察兵在街上走动。我回到家时看到父亲和叔叔正在打麻将,我心想:“这都什么时候了,你们还在这里‘醉生梦死’?”

不到一个礼拜,学校就恢复了上课,军代表朱刚进驻,接管了一中,重新建立起学校秩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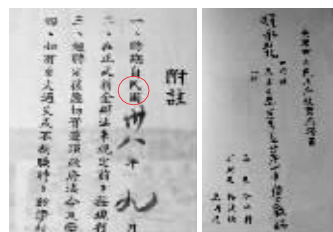
1950年,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,我投笔从戎,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,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军人。1958年退伍时,我27岁。



解放前夕赵承龙(右上)与同学在中央大学内留影



赵承龙的大学毕业证书



解放后赵承龙的聘书上有“民国”字样

这一年,我的大学毕业证迟发了

口述者:赵承龙 男 生于1926年 南京解放时住文昌桥原中央大学学生宿舍,大学生

1949年4月23日早上,我走出宿舍,想回文昌巷的家里看看。走到碑亭巷附近一个小邮电所时,看到很多人在打电报,于是我也进去发了一份报平安的电报。走出邮电所,就听到“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口号由远而近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……



赵承龙

校园里很平静,当时我正在忙着做毕业论文

南京解放前夕,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,住在四牌楼文昌桥原中央大学学生宿舍,这里现在是东南大学的学生宿舍区。当时我们正在做毕业论文,虽然国民党准备撤离南京,但校园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的。校内成立了应变会,储备了粮食,组织好对学校财产的保护。宿舍门口的“民主墙”上充满了反对搬迁和全力保卫学校的大字报,民主进步的气氛仍然成为主流。其他一切也都正常,该上课上课,该写论文写论文。

当时的社会上则不同。我虽住在校内,但我父母和哥哥都住在太平路文昌巷,所以校外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,比如物价飞涨,粮店被抢,钞票贬值等。我母亲就经常要到粮店排队买米,去晚了就买不到了。不过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正常过,没有出现惊慌和大逃亡场面,真正忙着撤退的都是国民政府的高层和军队。我哥哥当时就在教育部工作,他是里面的一名会计,压根没想过要逃跑什么的,还是按点上下班。

解放前一晚听到爆炸声,第二天又恢复平静

南京的解放可以说是很平静,除了解放前那一晚,也就是4月22日晚,我在宿舍里听到远处传来很响的爆炸声,当时心里稍微有些紧张。但一夜相安无事,第二天打听到,这些爆炸声来自当时国民党的军工企业,位于今天的晨光机械厂那里,可

能他们撤离前不想留下什么东西,就把里面的东西炸毁了。

4月23日早上,我走出宿舍,想回文昌巷的家里看看。在走到碑亭巷附近,经过一个小邮电所,看到很多人在打电报,于是我也进去发了一份报平安的电报,是发给我在重庆的二姐。

刚走出邮电所,就听到“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口号声由远而近,街旁也站满了人群,一支穿着黄绿色军装的队伍精神抖擞地走过来。我很好奇地拨开人群挤到前排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,和我之前看到的国民党军队形象完全不同,国民党军队的制服和皮鞋都是又新又亮的,但解放军穿得却很朴素。

我的毕业证到1950年才拿到

南京就在这样的平静气氛中和平解放了,对我们学生似乎没有任何影响,我们在那年依然按照毕业流程,进行了论文答辩,拍毕业照,只是那年的毕业证迟发了几个月。

因为学校在解放后,由军代表暂时接管,校名也改为国立南京大学,这些都要体现在毕业证上,所以我们这一届的毕业证就拿得迟,到第二年才拿到(虽然毕业证上写的是1949年8月,其实是1950年才拿到的)。毕业证上的校名和印章也不同了,其中有一颗“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”的印章,体现出南京解放了。

有意思的是,我毕业后拿到的第一张聘书上,其日期还是写着“民国38年9月起至39年1月底”的字样。这些证书我至今还保留着。